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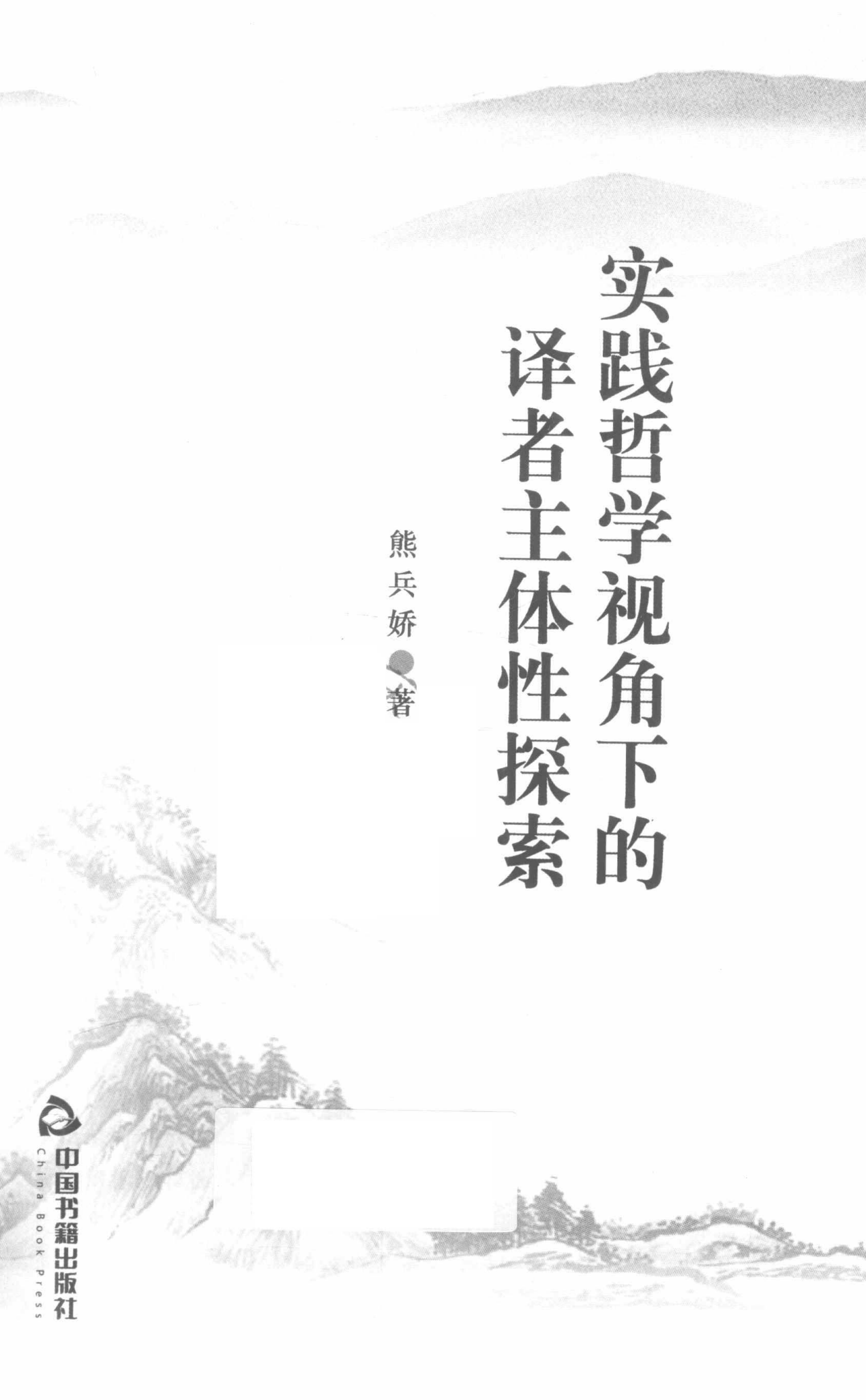
实践哲学视角下的 译者主体性探索

熊兵娇 ● 著

海外借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实践哲学视角下的 译者主体性探索

熊兵娇 ●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哲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索/熊兵娇著. —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12
ISBN 978-7-5068-5984-4

I. ①实… II. ①熊… III. ①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94662 号

实践哲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探索

熊兵娇 著

策划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立云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封面设计 文人雅士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 （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eo@chinab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84-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说起来，我似乎从来没有写过明确以译者主体性为标题的文章，也没有在哪篇文章或哪部专著里明确探讨过译者主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关注译者主体性问题，更不意味着我对译者主体性问题没有思考。其实，译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关注长期隐身在幕后的译者以及译者在目标语系统中的影响与作用。前几年我推出了一本小书——《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我在书中指出，“译者的隐身与现身”是传统译论发展到当代译论的转折点：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译论一直强调“原文至上”，确立“忠实是判断译文优劣的唯一标准”，要求译者跟在原作的后面“亦步亦趋”，译者成了“隐身人”；而当代译论，包括译介学理论，则要彰显译者主体性，要让译者“现身”。我特别强调，翻译的本质就是要实现跨语言和跨文化的有效交际，而译者应该确立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崇高使命，为促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做出贡献。

然而，大多数研究译者主体性的学者似乎并未发现译介学与译者主体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其原因很可能出在我戏称的“网络依赖症”上：一些研究者不是尽可能地占有相关资料并认真研读，而只是在网上轻松地输入“译者主体性”这个关键词，然后根据网上显示出来的若干篇相关文章，以此为据展开研究。如此一来，只要你的文章标题和正文中没有出现“译者主体性”这个“关键词”，即使你文章的内容跟译者主体性讨论有关，甚至密切相关，你的著述也进入不到这些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这一点上，本书作者熊兵娇

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敏感性。她在书中梳理国内译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研究的课题史时敏锐地发现，我在拙著《译介学》里关于“创造性叛逆”的阐释把连同译者、读者在内的接受环境一并称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是对此前译学界关于“主体即人”主体思想的“挑战”。

当然，兵娇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并不是遵循译介学的研究视角，而是以实践哲学为理论视角，超越主体性的主观理性的匡囿。她借鉴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知识，看到了翻译作为人类的一项重要社会活动，既是社会性的，又是历史性的，看到了翻译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这样，在她的笔下翻译就跳出了传统的“纯语言转换”的视域，而具有了“改写”“改造”“再造”或“重构”的意蕴与功能。在此意义上，翻译面对的就不是一个“原文—译文”的两极世界，而是进入了一个“原文—原语语境—译者—译语语境—译文”的多极世界。这样，译者作为联系原语语境和译语语境的“中间环节”，就不再扮演“摆渡人”和“传声筒”的角色，而是必然会积极地参与到原文意义和话语的重建中去。

为了进一步深入阐释译者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即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兵娇还借用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指出翻译的“第三空间”意味着意义的生成不是自身而为，而是“建构在一个相互区别与相互冲突的阐释空间之中，进而强调意义……不是原始的统一体或不变物；相同符号可以被再阐释、再历史化，以及再解读”。这就表明，译者不可能“赤条条”地进入文本之中，而必然会带有自己的文化视野与历史踪迹。兵娇指出，翻译是空间内的意义生产，而译者对原作的解读过程也就是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对原作的一种空间性重构。我认为如此阐释译者主体性（即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是深刻且富有新意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本书第四章对《珍妮姑娘》和《飘》的两

个不同时代的中译本所做的对比分析。兵娇采用丰富的译例，分别从人物形象译介和文化图景译介的差异性切入，进一步论证了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在文本意义的生成与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对译者的社会性与历史性的阐释更加生动、更具说服力。

本书作者熊兵娇是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招收的第二届翻译学博士（于2006年9月入学）。在学期间，她就表现出对翻译理论的浓厚兴趣，获得过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学术论文一等奖等科研奖项，在平时的课堂讨论中她经常会发表一些颇具独特感悟的观点。2009年6月她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并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自愿到家乡的学校——江西财经大学任教至今。走上工作岗位后，她仍一如既往地刻苦勤奋，著译不辍，成果甚丰。她翻译出版了梭罗的《瓦尔登湖》、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多部译著；在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等论文多篇；参与编写《汉英笔译全译实践教程》《研究生英语写译教程》等多部翻译教材；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

让我倍感欣慰和更为赞赏的不止是上述这些丰硕的成果，而是她为取得这些成果所付出的努力和表现出来的精神。兵娇的人生道路其实并不那么平坦，但她在遭遇困难时总是能冷静、乐观以对，并以超凡的勇气，坚毅地朝着自己的既定人生目标奋进。所以，每次见到她，总是能看到她灿烂的笑容，听到她朗朗的笑声。凭着这样的精神，我相信兵娇在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学术道路上，一定能取得更为优异和出色的成绩。

是为序。

谢天振

2016年冬于广西北海
恒大御景花园

目 录

绪 论	1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二、研究问题、目标与意义	29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31
四、研究内容与研究的局限	32
第一章 主体的反思	34
第一节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视野中的译者	34
一、传统译论中的译者地位与形象	35
二、“文化转向”及其现实意义	41
三、“文化转向”视野中的译者身份与主体性	47
第二节 主体、主体性问题探讨	51
一、作为哲学问题的主体与主体性	51
二、主体间性与主体性	57
三、主体性困惑与无法消解的主体性	62
第三节 本章小结	67
第二章 理论的透镜	68
第一节 马克思实践哲学概述	68
一、关于实践哲学	69
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涵及其理论意义	77

第二节 实践哲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83
一、理论哲学路径下的翻译研究	84
二、实践哲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89
第三节 译者作为实践主体及其主体性内涵	93
一、译者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	93
二、译者作为实践主体的社会性与历史性	97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02
第三章 时空的演绎	103
第一节 译者——突围的“他者”	103
一、译者：从他者之境走向主体身份	103
二、译者与翻译的“第三空间”	107
三、译者突围的意义——译者的社会角色与 历史功能	112
第二节 译者何为：面对“异”的两难	116
一、翻译中“异”的问题	116
二、翻译：求同还是存异？	120
三、译者与翻译：“异中存同”与“同中见异”	124
第三节 译作——主体建构的“第三生成物”	127
一、“第三生成物”的本质内涵	128
二、译作：主体建构的“第三生成物”	132
三、影响译作生成的可能性因素	13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40
第四章 译者的介入	141
第一节 相同人物 不同形象：从《珍妮姑娘》译本 看译者的介入	141
一、德莱塞与《珍妮姑娘》的简介	141

二、相同人物 不同形象：《珍妮姑娘》主要人物 形象的译介	146
三、译者的介入：形象差异背后的原因探析	160
第二节 相同图景 不同文化：从《飘》译本 看译者的介入	165
一、米切尔与《飘》的简介	165
二、相同图景 不同文化：《飘》的文化图景 及其译介	169
三、译者的介入：文化差异背后的原因探析	190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95
结 语	197
参考文献	202
后 记	225

绪 论

译者主体性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翻译研究课题,从研究的发展脉络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翻译研究,对译者主体性的关注都经历了一个由遮蔽、排斥到凸显、高扬的过程。纵观中国翻译史,对译者的论述自古就有,但大多是对译者的素质和能力上的要求与规定,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①,彦琮的“八备”^②,梁启超的“三通”^③,等等。在西方,西塞罗提出:“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④德莱顿说:“无人可译诗,除非是具有诗歌创作的天赋者。”“要做翻译,译者必须首先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母语批评家。”^⑤诸如此类的论述还可列举,此处不予赘述。这些对译者的要求与规定可谓近乎完美,却未能揭示出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主体性特质,译者的主体性由此被遮蔽。可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翻译研究又将视角投向两种语言转换的规律与模式的探究,凸显了一种“工具理性”,忽视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人文历史性:翻译被看成是寻找对等语或等值关系的一个科学化过程,译者犹如翻译机器。由此,译者的主体性被排斥。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动下,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开始遭到质疑,封闭、单一的结构被打破,确定性和终极性意义被消解,理论研究从独白走向对话,研究视角也由一元转向多元。这时,

①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第37页。

② 同上,第53-54页。

③ 梁启超:《论译书》,见《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9页。

④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0页。

⑤ John Dryden, “On Translation,” in Rainer Schutle & John Biguenet, eds.,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An Anthology of Essays from Dryden to Derrid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p. 24.

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及其主体性得以彰显。在这一研究动向的引导下，国内外译学界才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主体与主体性探索。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确切地说是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从主体与主体性概念的内涵与演变来看，研究者对译者主体和主体性的探讨受到了哲学主体性思想和文学主体性论争的启发^①，而后期所开展的大量研究也明显受到了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国内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我们以“译者主体性”为“篇名”检索中国知网，共检出期刊论文 1166 篇，硕士论文 719 篇，博士论文 7 篇（时间截止到 2015 年，统计数据不包括更多涉及和探讨“译者主体性”但未在篇名中予以明确体现的论文），另外还有专著及其中的部分章节。在此我们仅从译者身份的定位与主体的确立，主体性的内涵、表现与制约因素，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向，以及主体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四个方面进行述评。

（1）译者身份的定位与翻译主体的确立

国内众多学者从翻译主体的角度对译者的身份做了界定与论述。从现有文献判断，最早提出“翻译主体”概念的是辜正坤。他在孙迎春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的序言“翻译主体论与归化异化考辩”中谈到，他 1982 年就使用了“翻译主体”这个提法。他认为，一个主体是否为主体，取决于该主体在某一特定行为状态中的功能^②。受到哲学思想——“主体即人”的启发，他将主体分为“原作主体、翻译行为主体、翻译读者主体和翻译批评主体”，并指出就翻译行为或翻译过程的执行者而论，译者是“翻译行为主

① 20 世纪 80 年代刘再复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文学主体性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并引发了强烈的学术反响，对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与争鸣无疑也为国内译界的译者主体性思考提供了指引与方向。

② 辜正坤：《序一：翻译主体论与归化异化考辩》，见孙致礼：《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年，第 vii 页。辜正坤用“翻译主体”指代翻译家，之前是否有人使用过这一说法不得而知。但辜正坤认为，“翻译主体研究”过于笼统，不如用“翻译家研究”明白易懂。

体”^①。

一般认为，国内最早对“翻译主体”进行专门论述的是杨武能。他在《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一文中指出：“同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原著和译本，都不过是他们之间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工具或载体，都是他们的创造的客体。而在这整个的创造性活动中，翻译家无疑处于中心的枢纽地位，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② 在1993年发表的《尴尬与自如 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漫说》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在文学翻译这一特殊的艺术创造过程中，翻译家处于中心的、最积极最能动的位置，没有译家全身心地投入，只有机械地操作，就没有艺术。”^③ 杨武能不仅将主体界定为人，且认为翻译的主体应该包括译者、读者和作者，与此同时他突出强调了译者的中心地位。译者处于中心地位是不容置疑的，但译者是否是唯一主体呢？针对这一问题，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陈大亮^④、胡庚申^⑤皆认为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那么，作者和读者是否为主体呢？这还与如何定义翻译有关^⑥。查明建、田雨认为，如果翻译专指翻译行为本身，那么翻译行为主体就是译者，原作、作者和读者都是译者实践活动的对象；如果翻译指涉翻译活动全过程所有相关因素，那么译者、作者和读者都是翻译主体^⑦。也有学者提出了中心主体和边缘主体的概念，认为译者是中心主体，而原作者和读者是影响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⑧。显然，将原作者和读者排除在主体之外，是把翻译当作一种主体性行为来理解的，因为原作者和读者不是翻译行为的执行者，所以本质上他

① 辜正坤：《序一：翻译主体论与翻译归化异化考辩》，见孙致礼：《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第vii页。

② 杨武能：《阐释、接受与再创造的循环——文学翻译断想之一》，见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7-228页。

③ 杨武能：《尴尬与自如 傲慢与自卑——文学翻译家心理人格漫说》，见许钧主编：《翻译思考录》，第263页。

④ 参见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⑤ 参见胡庚申：《从“译者主体”到“译者中心”》，《中国翻译》2004年第4期。

⑥ 参见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⑦ 同上，第21页。

⑧ 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3年第6期，第9页。

们就属于客体。谢天振挑战了“主体即人”的主体思想,他从创造性叛逆的视角出发,指出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主体,除译者外,读者和接受环境也同样是创造性叛逆的主体^①。这一独特观点主要立足于文学翻译的接受层面。一部翻译作品进入不同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不同的读者或读者群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但接受环境作为主体是永远不能离开读者这一主体而实现其主体功能的。

“谁是翻译主体?”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理解和考察的视角不同,得出的答案自然有异。许钧就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得出了四种答案:一是译者为翻译主体,二是作者和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作者、译者和读者皆为翻译主体^②。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狭义的翻译主体”和“广义的翻译主体”。此外,对译者身份和翻译主体进行界定与研究的还有穆雷^③、高宁^④、王文斌^⑤、徐岚^⑥、吴波^⑦、王玉括^⑧等。通常情况下,不管原作者和读者是否为主体,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地位是确定无疑的。翻译作为一种以人为思考和创作中心的艺术活动,对翻译活动主体——译者的研究应该加以重视^⑨。

综上所述可见,现有研究大都突出强调了译者的主体或中心地位,传统译学观念中译者的被动性与附属性已经遭到质疑,译者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翻译过程必然是人的活动过程,作为实践者,译者的主体地位不容忽视,它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或中心。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②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10页。

③ 参见穆雷:《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兼评中国翻译家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

④ 参见高宁:《论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兼论翻译标准的设立原则》,《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1期。

⑤ 参见王文斌:《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主体作用的必然性》,《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年第2期。

⑥ 参见徐岚:《论译者的主体地位》,《中国科技翻译》2005年第3期。

⑦ 参见吴波:《译者地位边缘化成因及其对策初探》,《国外外语教学》2004年第1期。

⑧ 参见王玉括:《译者的身份建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⑨ 袁莉:《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见张柏然、许钧主编:《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98页。

（2）译者主体性的内涵、表现与制约因素的探讨

译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之后，就面临译者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性的表现及其制约因素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学界展开了积极的思考和有益的探索。

主体性问题本是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人类的发展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相互促动、相互关联的。这样，人的主体性的澄明也必然体现为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在西方哲学史上，主体性的内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嬗变，即由古代本体论哲学的物我同源的无主体性（主体的实体性范畴）到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认知主体性（主体的能动创造性范畴）到现代哲学的生命主体性（主体的人本性范畴）再到当代哲学的离散主体性（主体的多元性范畴）。毫无疑问，哲学的主体性研究可为译者主体性（或翻译主体性）研究提供有效的理论借镜。

从国内译者主体性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主体性内涵的界定大多是从近代哲学的主体性思想中获得灵感，并将其运用于翻译主体性或译者主体性概念的界定中。如查明建、田雨指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① 屠国元、朱献珑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就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的影响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② 许钧对主体性也做了界定，只不过他强调的是翻译主体性，认为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③。与此同时，他还对译者的主体意识做了界定——“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④ 显然，国内学者对主体性的定义大多强调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相同或类似的观点还可进一步例举。例如：王友贵将译者主体性界定为“译者在原作选择、原作评

① 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第22页。

② 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第9页。

③ 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第9页。

④ 同上。

价、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身份建构、翻译过程中所表现的主观能动性”^①。陈梅认为：“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作为翻译的主体在对原作的翻译活动中所体现的能动地改造原作、控制原作、使原作为译者主体服务的特性。”^② 廖志勤将译者主体性界定为“译者在尊重时代文化语境和翻译对象的前提下，在思想意识、文化价值取向、翻译理念及审美意识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主观能动性”^③。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对主体性进行明确的界定，但在行文中间接表达了对主体性的认识与理解。例如：廖晶、朱献珑提到了译者的主体性因素，诸如译者的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和在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艺术人格自觉和审美创造力等^④。穆雷则从“主观努力”和“主观愿望”强调了译者的主观性^⑤。从与这些同期或不同期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研究者对译者主体性内涵的界定大都使用以上定义或做出与其相似的解释与说明。

从上文所列举的几种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凸显了主体的主观性及其自主自觉意识。然而，主体性不仅表现为主观能动性，它同时还包含受动性^⑥。受动性是主体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是主体发挥能动性的客观根据，也是客体对象对主体的制约性^⑦。通过对据有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不少学者在关注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触及了主体的受动性。仲伟合、周静通过梳理国内研究对主体性含义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主体性定义，他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

① 王友贵：《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外国语言文学》2007年第1期，第40页。

② 陈梅：《外部力量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以〈圣经〉翻译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6期，第51页。

③ 廖志勤：《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31页。

④ 廖晶、朱献珑：《论译者身份——从翻译理论的演变谈起》，《中国翻译》2005年第3期，第17页。

⑤ 穆雷：《翻译主体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翻译》2003年第1期，第16页。

⑥ 魏小萍：《“主体性”涵义辨析》，《哲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23页。

⑦ 同上，第24页。

凸显了主体的受动性^①。他还就译者的文化先结构、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原作者以及文本选择对译者的影响、译者的诠释空间、译文接受者等角度具体分析译者的“受动性”的表现^②。还有学者在肯定译者的主体能动性的同时,提出“受动中的能动”,认为这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状态更有利于译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③。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以“制约因素”^④“外部力量或客体的制约性”^⑤“操纵性”^⑥“客观性”^⑦“受限”^⑧“限度”^⑨“客观制约性”^⑩“社会历史视野”^⑪等角度为切入点,从政治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读者、文学文化系统、社会经济结构等外部因素和译者的审美趣味、生活经验、社会文化视野等内部因素出发来理解、探讨主体的“受动性”。陈大亮对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能动性”的含义混同现象进行了批判,并指出这一界定忽视了主体性还有受动性的一面,认为“主体性说到底能动性 and 受动性的辩证统一”^⑫。译者主体性研究不能忽视主体的受动性,主体性必然是主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然而,目前对主体的受动性的研究并不深入,只是拘于从观点上简要介绍或理论上扼要阐发。

① 参见仲伟合、周静:《译者的极限与底线——试论译者主体性与译者的天职》,《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7期。

② 同上,第44-45页。

③ 参见董广才、刘佳:《受动中的能动——谈译者翻译主体能动性》,《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④ 参见裘姬新:《译者的主体性及其制约因素》,《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⑤ 参见陈梅:《外部力量与译者主体性的建构——以〈圣经〉翻译为例》,《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6期。

⑥ 参见魏家海:《文学翻译的操纵性与主体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⑦ 参见曹少森、冯文坤:《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双重性》,《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⑧ 参见喻锋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谈译者主体性的介入和受限》,《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⑨ 参见邓巨、秦中书:《阐释过程中译者的空间与限度》,《中华文化论坛》2007年第1期;谢世坚:《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及其限度》,《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⑩ 参见曾利沙:《论翻译的艺术创造性与客观制约性——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个案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⑪ 参见唐洁、舒奇志:《相同人物 不同形象——从〈红字〉两译本的文字处理看译者社会历史视野对译作的影响》,《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⑫ 陈大亮:《谁是翻译主体》,第4页。

我们认为，如果在理解主体性的时候只强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忽视主体的“受动性”，就可能会落入把主体性等同于主观自由的险境，这种担忧并非多余。事实证明，人们对主体性的认识往往就会陷于这样一种尴尬，即把统一存在于主体性之中的主观能动性和受动性二者割裂、对立起来，并以这一认识为前提得出：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便是主体的主体性遭到压制、消解或削弱的表现。我们选取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来加以陈述。必须指出，他（她）们对译者主体性的讨论是基于某种理论预设之上，因此对主体性内涵中的受动性自然就会缺少应有的关注。

王友贵在《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①一文中对译者主体性进行了界定，突出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并指出我国译者的主体性突出表现在翻译的三个方面：一是原作选择（含原作评价）；二是译者的文化意识、身份意识；三是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在此基础上，他指出，译者主体性削弱的表现就是：译者没有自主的原作选择权、评价权，身份意识和文化建构意识淡漠，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为政治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所左右；由此进一步阐述，造成译者主体性削弱、缺失的原因有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文学文化系统因素、制度因素、编辑出版人因素、读者因素，以及译者自身因素。最后，他得出结论：由于翻译的“工具论”，加上体制、译作生产方式等对翻译的制约，使得本期译者的主体意识淡薄，主体性受到削弱。显然，王友贵是把译者主体性理解为译者的自主与自为，将其看作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译者的“我思”与“我感”。毫无疑问，这一理解割裂了主体性中能动性、受动性的统一。此外，他还认为，主体性的发挥是衡量译者是否优秀的尺度，是译者的翻译能力的体现。他说：“一般而言，译者愈优秀，其主体性表现愈强烈。”^②不但译者主体性的现实基础被彻底抽空，而且译者主体性的概念被“译者的翻译能力”置换。

孙艺风在《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③一文中将“主体意识”界定为译者

① 参见王友贵：《当代翻译文学史上译者主体性的削弱（1949—1978）》，《外国语言文学》2007年第1期。

② 同上，第41页。

③ 参见孙艺风：《翻译规范与主体意识》，《中国翻译》2003年第3期。